

【湖湘学术名家专栏】

特约主持人：向志柱研究员

【编者按】湖湘近代以来多奋强卓异之才。在我国当今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界，湘籍名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刊自2020年起特设“湖湘学术名家专栏”，以集中展示湖湘学人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中具有中国气派、湖湘品格的理论智慧和理论创新。“专栏”不定期推出，与此前的“特稿”交替并置于卷首。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胜脱贫攻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意义重大的新的一年，我们期待通过本专栏的开设，能够得到更多湖湘学术名家的支持，以加快本刊走向国内一流社科名刊的步伐。

宋代书院的《四书》学教育

朱汉民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宋代书院与理学学术同时兴起的现象。理学家以《四书》作为书院教育的经典，将理学化《四书》学广泛传播于民间社会，深刻影响了朝野的士大夫群体。宋儒《四书》学确定了“学以成圣”的教育目标，鼓励士大夫具有崇高的道德人格，能够承担起共治天下的政治责任。宋儒通过书院的《四书》学教育，提升士人作为政治主体、文化主体的追求，并推动理学在民间社会的传播，促进了士大夫群体思想共识的形成。

关键词：《四书》学；书院；理学；教育；思想共识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0)03-0001-10

两宋时期，在复兴儒学、回归孔孟之道的思想背景下，理学派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是理学家的思想主张并未得到朝廷的认可，因此理学及其《四书》学主要通过书院教育等民间教育、地方学术的方式传播和推广。恰恰由于这一种民间教育、地域学术的形态和途径，推动了理学的广泛传播与推广，促进了宋代士人的思想整合，推进了两宋时期士大夫群体的思想共识的形成。

本文拟通过书院的理学及《四书》学教育，探讨宋代儒学的思想整合问题。理学从学术初起到繁荣发展，均与宋儒建立的书院教育、学术传播与思想整合有密切关系。

一、理学初兴与书院教育

汉代经学的兴起，完全是朝廷“罢黜百家，表彰

六经”的自上而下的学术推动，并主要借助于太学以及相关的博士制度。而理学初兴，却主要是儒家士大夫自下而上的学术传播，主要借助于民间学术-教育机构的书院。

书院是唐宋时期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教育组织形式。“书院”萌芽于唐，盛行于宋。最早的唐代书院还只是皇家的藏书之地，后来由逐步演变成民间的藏书、读书之地。到了宋初，“书院”逐渐演化为民间的私人讲学的教育机构，以后进一步发展为教书、写书、出书的重要学术教育机构。

宋代书院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千余年来中国传统教育形式不断发展、演化的结果，书院吸收了先秦私学争鸣、汉代精舍研经、魏晋谈玄析理、隋唐寺院禅修的学术与教育传统，满足了宋代士人自由讲学、研究经典、学术辩论、修身养性的不同文化任务，这些历史上不同的讲学形式、修身方法，在宋代书院的

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中均可以找到。可见,书院之所以能够成为延续千年的教育-学术机构,缘于其集传统教育形式之大成。宋代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不仅仅在教育组织形式方面集传统之大成,其传播的思想内容理学及其《四书》学也是如此。宋代书院形成后,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即唐宋之际学术变革、理学及其新经典体系的形成,理学家急于寻找一种新的教育组织与学术传播的组织机构。宋儒不仅希望批判佛道二教,也努力摆脱汉唐经学的约束,希望实现宋代儒学的重建。宋代书院的发展过程,就是与宋代文化复兴、重建儒学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

考察宋代学术史可以发现,书院的兴起与理学思潮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宋代学术初兴于庆历之际,被认为广义的“道学”(理学)先驱人物包括范仲淹、孙复、石介、胡瑗等士大夫集团^[1],他们既是早期道学的倡导者,也是宋代早期书院教育的推动者。早在北宋时期,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士大夫集团,均是推动宋代儒学复兴的推动者,同时也是创办书院以改革教育的教育家。天圣四年(1027年),范仲淹丁忧居南京应晏殊聘请掌教应天府书院。他通过掌教应天府书院以推动端正士风的教育改革,据《年谱》记载:“公常宿学中,训智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2]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的教育实践,推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与完善,也推动了书院与宋学的紧密联系,特别是培养了著名的“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与胡瑗等,这三个人又成为北宋教育改革的重要人物。其中胡瑗是推动地方官学改革、创立“苏湖教法”的著名人物,他推动地方学校以“经义”“治事”的分斋教学,以培养有体有用之人才,促进了宋代儒学的复兴和发展。孙复、石介则致力于书院教育的改革,是书院成为宋学兴起的学术和教育大本营。孙复就是范仲淹掌教应天府书院时培养的杰出人物,后来他又在应天府书院任教,后来他长期居泰山讲学读书,并创建著名的泰山书院。孙复长期主持泰山书院,称“泰山先生”。石介也是如此,曾求学于应天府书院,但他后来又拜孙复为师,执弟子礼。石介也致力于宋学和书院的共同发展,故而创办和主持了徂徕书院。石介有非常明确的“道学”目标的追求,有着鲜明的传承和复兴儒家之道的道统意识,并且将此道统意识与书院建设结合起来。他在《泰山书院记》中,就将道统承传与书院使命统一来说:

“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3]由于石介长期在徂徕并主持书院讲学,学者称他为“徂徕先生”。范成大《石鼓山记》将徂徕书院列入北宋四大书院。他说:“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石鼓、岳麓。”^{[4](1722)}从范成大的说法中,可以看到石介等宋初儒者在书院教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熙宁变法以后,王安石的“荆公新学”通过官学途径而获得极大发展。王安石扶持官学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在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推行“三舍法”,强调一切士人均需通过官办学校才能够获得仕进的机会,还以《三经新义》统一学校教学和选拔官员。这样,就使得作为宋学学派之一的“荆公新学”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获得了官方儒学的地位,也成为士人必须学习的基本科目和教材。王安石的“荆公新学”不仅抑制了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抑制了书院的发展。但是,就在王安石“荆公新学”如日中天的时候,理学派被迫开启民间教育的模式。理学家未能够通过官学传播自己的学术,他们开始探讨以非官方的书院教育形式,以推动理学及《四书》学的传播。

关于北宋理学的书院讲学活动,从留下的文献记载来看,主要有理学开山周敦颐晚年隐居庐山,创办濂溪书堂,在此读书讲学。据潘兴嗣《周敦颐墓志铭》记载,周敦颐“曾过浔阳,爱庐山,因筑室其上,名之曰濂溪书堂,每从容为予言:……次濂溪者,异时与子相从于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5]据度正《周敦颐年谱》记载,濂溪书堂始建于嘉祐六年(1061年),而且周敦颐在此书堂实现其“与子相从于其上,歌咏先王之道”的专门从事学术和教育的人生理学。他在书堂“汲汲于传道授业”,同时也与同道人士相与讲学论道,如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江南西路转运使李大临“以诗谒先生于濂溪书堂”^[6]。由此可见,周敦颐晚年隐居庐山的濂溪书堂,也是新儒家学者通过“书堂”“书院”形式,从事学术研究、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

以书院为基地从事民间讲学,成为理学派的一个传统。周敦颐之学的继承和发扬者、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两兄弟,他们也是通过书院研究与传播理学。与二程兄弟讲学活动有关的书院有两所,一所是原有的嵩阳书院,一所是新创建的伊皋书院。嵩阳书院是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二程兄弟长期以家乡洛阳为

基地从事学术、教育活动，故而史称为“洛学”。嵩阳书院创建于北宋初年，许多大儒在此讲学，它同时也成为二程兄弟的讲道之所。后代学者对此事有许多追记。当然，二程“洛学”讲学更多的书院，应该是“伊皋书院”。元丰五年(1082年)，文彦博曾经赠送程颐一处庄园，程颐在此创办了伊皋书院。后改名“伊川书院”。程颐“伊川”之名号与此有关。二程兄弟的学术教育活动不仅仅是洛理学的私人教育，虽然没有强大的政府资源，其办学条件也非常有限，但是理学的教育是凭借其思想的影响力、学术的说服力，故而影响了一大批有思想、有才华的有志青年。程门弟子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由于他们继承了二程这一种私人讲学的传统，使得北宋形成的理学能够大盛于南宋时期。

可见，书院的民间性质，更能够让民间学术的理学获得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故使得理学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宋学学派。理学派真正能够成为朝野士人、士大夫普遍关注、认真学习、逐渐认同的思想学说，这与南宋时期理学家进一步在民间社会创办、运用书院教育、全面推广和传播理学及《四书》学有密切联系。

二、南宋书院的《四书》学教育

南渡以后，东南理学出现大盛的局面，南宋的不同学统大多是二程洛学之传的结果。而且，南宋理学之所以发达，并且在社会知识界形成一个广泛的政治力量与文化力量，与理学家充分借助于书院作为理学及《四书》学的学术重镇和教育基地密不可分。他们将理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广泛传播于民间社会，深刻影响了朝野的士人、士大夫群体。南宋理学繁荣、书院发达，理学成为大多数书院的主要学统。

南宋初年最早创办书院，在民间社会从事理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活动者，是胡安国、胡宏父子。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胡安国、胡宏父子从荆门隐居湖南湘潭碧泉，创办了碧泉书院。胡宏为碧泉书院写的上梁文提出：“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袞袞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跼济。”^[7]书院建成后，许多志学求道的青年，皆来此求教于胡宏，故而碧泉书院具有典范意义，即以书院组织开拓地域性理学的“学统”。通过书院教育以创建理学学统，成为

南宋以后的重要教育形式和主要学术形态。

理学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进入大盛时期，同时也是书院教育的大盛时期。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均是创办书院，以培养理学人才，推动理学学术的发展。与此相关，理学化的《四书》学教育，也一直和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

南宋乾道初，张栻主持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张栻希望这一所书院能够成为理学学术和人才培养的基地。张栻在他撰写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认为岳麓书院应该避免官学教育的种种弊端，要回归儒家的“为己之学”“学以成人”的教育理念。他希望将岳麓书院办成不同于官学的一种儒家教育的典范，不以科举利禄为教育目标，而是应该追求“成就人材，传道以济斯民也”。因此，以内圣之学为重点的《四书》学自然成为岳麓书院的主要教材。张栻特别强调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教育学生的重要性，为了适应书院教育需要，他专门撰写了《孟子说》《论语解》作为书院教学的讲义。他在《孟子说序》中说：“岁在戊子(乾道四年)，栻与二三学者，讲诵于长沙之私塾，窃不自揆，缀所见为《孟子说》。”乾道九年刻写成书，正式作为岳麓书院教学讲义。他在书前作《孟子讲义序》(又名《讲义发题》)一篇，对学生说：“栻以所见与诸君共讲之，愿无忽深思焉。”并在“讲义序”中主张“义利之辨”为入学首要课程。这一年，他还完成了代表作《论语解》，“辑《论语解》为同志者切磋之资”，并要求学生“所当终身尽心者，宜莫先乎此也”^[8]。可见，理学化《四书》成为书院教育的重要特色。

朱熹更是推动书院教育的创新和发展的著名理学家。他也是在乾道年间开始在福建创建精舍和书院讲学。乾道六年(1170年)，他于福建建阳县创建寒泉精舍，五年后与理学家吕祖谦在此讨论、编撰《近思录》。淳熙十年(1183年)于武夷山建武夷精舍。绍熙五年(1194年)又于建阳建竹林精舍，因学徒增多而不能容，故加以扩建并改名为沧州精舍。朱熹虽不明称其为书院，而实际上却仍把它们同书院等同视之，有时甚至直接称之为书院。如《朱子语类》卷九十载其所说：“新书院告成，明日欲祀先圣先师，古有释菜之礼。”此处所言“新书院”即是新扩建的沧州精舍。朱熹通过福建创办的诸多书院，奠定了闽学学统。朱熹推动的书院教育，是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教育理念，所以他也是一边在书院从事《四书》学研究，一边以《四

书》为教材培养生徒,《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其实就是他在书院的学术成果和教育成果。而且,朱熹不仅以他注释的《四书》作为书院教材,还将《四书》的基本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浓缩为书院的学规、学箴、教学法,落实于书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实践。南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朱熹知南康军时,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书院落成后,朱熹即往书院给学生讲授《中庸》首章之义^[9]。另外,朱熹还请著名理学家陆九渊于书院讲《孟子》,陆九渊讲《孟子》中“君子小人喻义利章发论”,这一内容,后来编成《白鹿洞书堂讲义》。同时,朱熹在沧州精舍讲学时,还要求学者“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著实行履。”^[1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熹亲自制定了体现《四书》学教育理念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选取《四书》学教育思想的精髓,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以《孟子》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书院的“五教之目”;以《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书院的“为学之序”;以《论语》中的“言忠信,行笃敬”以及《孟子》中的“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书院生徒的“修身之要”;以《论语》《孟子》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书院生徒的“接物之要”。这一《揭示》,通过对为学目的、内容、方法的规定,将书院教育完全纳入了理学化《四书》的轨道。《揭示》出现后,不断为其他书院所采用,到南宋后期,几乎为天下书院所共遵,对书院教育乃至公立学校教育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陆九渊则在江西贵溪创建象山精舍讲学,学术和教育活动皆达到极盛。陆九渊也重视《四书》学,他本人就提出,除了《孟子》特别重要外,其他“如《中庸》、《大学》、《论语》诸书,不可不时读之,以听其发扬告教。”^[11]可以说,在其思想体系建构过程中,陆九渊对儒家《四书》均有大量的吸收,其中,尤其以《孟子》为多,是其学术建构的主要资源。全祖望肯定陆九渊之学的内在精神与学术取向源自孟子:“象山之说,先立乎大者,本乎《孟子》。”^[12]陆九渊在主持象山精舍时,学术也是很盛,据其《年谱》记载:“郡县礼乐之士,时相谒访,喜闻其化,故四方学徒大集……先生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13](501-502)}陆九渊讲学注重《孟子》学的

“发明本心”,其《年谱》载:“(陆九渊)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兴起。”^{[13](501)}象山精舍从学陆九渊者人数众多,并且形成了以象山精舍为基地的象山学统。

全祖望所说:“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14]乾淳四君子之一的吕祖谦,系浙江婺州人,他所创立的学派称“婺学”或“金华学派”。吕祖谦晚年在婺州明招山创建丽泽书堂,据记载,他晚年“会友于丽泽书院,既歿,郡人即而祠之。”^[15]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经史之学时,留下了一些讲义。据吕祖谦“附录”卷一的《年谱》记载,他于淳熙六年编有《尚书讲义》,则是主持丽泽书院的讲义。《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收录有吕祖谦的《丽泽讲义》,内容包括《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四书》内容,同时也包括《周易》《诗经》《周礼》等儒家经典。

全祖望说:“故厚斋(王应麟)谓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栻)朱子(熹)而盛;而东莱(吕祖谦)之丽泽、陆氏(九渊)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传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4](1723)}南宋四大书院教学卓有成果,成为闻名全国的教育重镇,它们标志着中国书院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四书》逐渐成为培养、教育士人、士大夫的教材而提升为儒家经典文本。

三、《四书》学的教育宗旨

南宋书院教育的成功,在于这些理学化书院的精神吸引力和学术创造力。而宋代书院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它们很好地贯彻和实践了理学化的《四书》学教育宗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解析理学化的《四书》学教育宗旨。

宋代以后,儒学往往又被称之为“圣学”,但是在不同历史语境与不同经典体系中,“圣”的意义是不同的。早期儒家讲的“圣”是圣王,他们认为《六经》的制作者即三代先王才是“圣”,上古时期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通过治理国家、征服天下,并以其“德”而配天而成为“圣王”;但是,宋代以后,宋儒所讲的“圣”是儒者士人的“圣学”,《四书》作者孔子、

曾子、子思、孟子等是儒家士人圣贤的典范，宋儒主张普通士子通过学习、实践《四书》而“成圣”。所以，《四书》学成为一切普通士人如何成“圣”的“圣典”。

两宋时期，理学家通过民间书院的推广和教育，逐渐使理学化《四书》成为宋代士人普遍接受的思想共识，以推动宋代士人思想的整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本出于先秦儒家子学，本来就是儒家创办私学教学之用。宋代士大夫从《五经》之学回归先秦儒学，恰恰就是希望从先秦儒家子学中，需求新的思想资源。可见，无论是先秦作为子学的《论语》《子思子》《孟子》，还是到了两宋作为民间学术思潮的《四书》学，其知识创造、价值承担的主体一直是士人群体。宋代士人对这一类士人之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们纷纷以这些典籍作为自己或门徒“学以成圣”的基本经典，故而建立了一种新的经典体系，即《四书》学体系。

宋代士大夫群体以《四书》学著作为典范，启动以“求道”为目标的“修身”“成人”“成圣”的人生历程。而且，他们特别强调，《四书》的学习和研究并不是那一种学识炫耀、功利追求的“为人之学”，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强烈批判了秦汉以来学术界出现的种种弊端，他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16]宋儒希望建立的《四书》教育体系，就是希望士人们通过《四书》学习而能够成就内在人格、实现自我完善，也就是说，他们推动的《四书》学教育完全是一种“为己之学”。

宋代士大夫之所以提出回归先秦儒家的“为己之学”，是因为宋初以来，尽管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大大提升，他们的政治主体意识、文化主体意识大大增强，但是他们整体的道德素质、人格精神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宋初以来，从中央的太学到地方官学，主要存在几个重要的弊端。其一，就是所谓“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17]，从宋初朝廷规定国子监学习《五经》，到后来拓展到《九经》，其实均是将汉代以来以经学的章句训诂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皮锡瑞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傅，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18]士子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更不用说能够以经典修身，提升自己的精神人格。其二，宋代朝廷努力将学校教育 with 科举选拔结合起来，使学校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功利之习占据学校的主导地

位。朱熹针对这一现象批评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雋于场屋者耳。士之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19]上述两个原因，使得士林风习出现种种缺乏德性、争名夺利等一系列急于改善的现象，具有忧患意识的宋儒倡导重读先秦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将这些儒家子学看作是使得士大夫群体的“为己之学”，确实是一种有感而发的教育主张。宋代《四书》学的兴起，始于宋代士大夫倡导一系列新的文化理想与教育理念，理学及《四书》形成后，他们需要在民间书院进一步从事学术推广和思想整合，希望形成一种以理学化《四书》学的思想共识。

中国的传统教育学术向来是一体的。孔子整理《六经》、为《六经》作传记的学术研究，其实是为培养儒家士人教育服务的。所以，《六经》及其传记之学既是儒学的学术成果，又是儒教的教育成果。宋儒不满汉唐儒家的《五经》之学，批判这一种经学教育让士子沉溺于章句训诂的知识教育，故而致力于《四书》学的经典诠释和义理建构，这一些与《四书》相关的解义、讲义、章句、集注、答问等，同样既是《四书》学的学术成果，又是从事教育的教学成果。

所以，从书院教育的视角考察宋儒建构的《四书》学成为士人普遍接受的基本教材，对确立士人基础知识、建构士大夫价值信仰、塑造士大夫人格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宋儒建构的《四书》学，显然不等同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而是经过宋儒创造性诠释而建构的《四书》学，那么，宋儒注释的《四书》学，究竟会以什么核心思想、价值信仰来塑造两宋以来的士人呢？

理学家诠释的《四书》学，其根本宗旨就是把《四书》看作是培养士人“学为圣人”之书。在汉代经学体系中，《五经》体系是以三代圣王之治的典范引导当朝帝王仿效之，所以说，汉代以来已经奠定的《五经》体系其实是“先王之政典”的帝王之学。《五经》的核心是以先王为目标的国家治理和礼法制度，士大夫研究《五经》学，就是从《五经》中寻求治理国家的制度和办法，以协助、成就帝王的政治事业。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只是由士人之书而提升为《五经》的传记之学，故而宋儒建构的《四书》

学体系,应该首先是一种士大夫之学。《四书》主要是以孔、颜、曾、孟等为典范,引导后来的士人仿效他们“学以成圣”,即是鼓励士人自己开启以“成圣”为目标的“修身”历程。无论是先秦作为子学的《论语》《曾子》《子思子》《孟子》,还是汉代作为《五经》的传记之学,或者是两宋作为独立经典的《四书》学,其知识创造、价值承担的主体一直是士人群体。理学家一直强调,他们之所以推动《四书》的学习和研究,其目标并不是一种学识炫耀、功利追求的“为人之学”,而完全是为了自己内在的人格精神、理想追求、自我完善,也就是一种“为己之学”。

所以,宋儒主张以《四书》作为培养士人的基本教材,特别强调《四书》“学以成圣”的教育宗旨。他们要求士人群体必须让自己确立一个高远的目标,就是通过《四书》的学习,而达到孔、颜、曾、孟那样思想高度的“君子”“圣贤”。所以,那些积极推动《四书》教育的宋儒,其实均是强调《四书》是士人的成圣之书。程颐说:“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大学》,圣人之完书也。”^{[20](311)}“《论语》为书,传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者矣。”^{[20](44)}“《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20](153)}张载也认为:“要见圣人,无如《论语》、《孟子》为要。”^[21]到了南宋,特别是经过朱子作《四书集注》之后,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宋代儒学的主流观点。他们将《四书》完全看作是士人群体如何成圣的“圣贤之书”:

圣贤之书,要旨每寓于篇首。《大学》之首,揭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要领;《孟子》之首,辨仁义与利之界限;《中庸》之首,明性、道、教之一原,皆要旨也。至若《论语》一书,孔门弟子记诸善言,隐然自有次序。^[22]

由此可见,在宋儒的集体意识、思想共识中,《四书》学之所以特别重要,就在于其核心思想是指导士人“学为圣贤”。

宋儒奠定了《四书》体系,希望宋代士人能够仿效孔、颜、曾、孟等先秦士人,开启宋代士人以“成圣”为教育目标,《四书》的核心是圣化士人。人们会问,宋代《四书》学鼓励士人“学以成圣”的历史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将这一个问题植入唐宋变革、士大夫崛起的大历史背景,才能够对宋代出现的这一种“学以成圣”思潮做出合理的解释。其实,希望士人“学以成圣”,其中包括确立士人的两个重要目标。

其一,宋儒《四书》学鼓励士人“学以成圣”,是希望崛起的宋代士大夫具有崇高的道德人格,能够

承担起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重大责任。我们知道,唐宋变革之际,宋代士大夫群体的社会出身、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使得他们承担的政治责任、历史使命更重,与这一种责任意识、使命意识相关的就是对士人的道德要求和人格期望。宋儒之所以将圣人作为自己的人生最高目标,表达出前所未有的既能够进取担当意识,其原因即在于只有“圣贤”这样的道德境界和崇高人格,才能够承担得起“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责任。宋代士大夫迫切需要提升士人的道德要求和人格期望的思想资源,而《四书》等先秦儒家子学恰恰具有更加丰富的资源。所以,宋儒诠释的《四书》学,将《四书》的教育宗旨确定为“学以成圣”的目的,首先是与培养士人以“圣贤”为标准的道德境界和崇高人格,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承担起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重大责任。

其二,宋代《四书》学鼓励士人“学以成圣”,还包含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希望宋代士大夫尽快推进“道治合一”政治理想,能够在与君主共治天下中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虽然首先肯定上古圣王“教治”合一的道统,但是他的主要目标则是强调春秋以来孔子及其诸弟子无“君师之位”却能够兴道统之教。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特别强调“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的道统意义,他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23]宋儒建构的《四书》学,就是这一种能够满足儒家士大夫承担道统传承、复兴孔孟之道的经典体系。朱熹建构了以《四书》为经典文献依据、以孔孟程朱为授受谱系的道统论。朱熹建构的《四书》学道统论,希望“士”如何以“帝师”“大夫”的双重身份,既以道统教育帝王又以道统治理国家。可见,宋儒的道统论包括两个阶段:有“君师之位”的圣王道统与无“君师之位”的士人道统,前者以《五经》为代表,后者以《四书》为代表。朱熹及其宋儒将代表士人道统的《四书》提升为儒家核心经典,就是突出了士人群体承担道统的重要意义。

四、《四书》学教育的历史影响

由上可见,宋儒《四书》学确定的“学以成圣”的书院教育目标,是为了鼓励士人崛起的宋代士大夫

具有崇高的道德人格，能够承担起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重大责任，在秦汉以后“君师”分离的条件下，能够承担起以道统教育帝王、以道学治理国家的重大责任。宋代书院鲜明地倡导“学以成圣”的教育理念，以满足作为政治主体、文化主体的宋代士人群体的普遍追求，推动了理学在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宋代士人的思想整合，最终推进了两宋时期士人群体的思想共识的形成。

南宋书院的理学及其《四书》学教育，其产生的思想整合作用和文化传播功能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以庆元党禁历史事件为时间轴心来考察这一问题。

庆元党禁事件发生之前，由于南宋理学发展的大盛，推动了书院教育的大盛。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均是创办书院的理学大家，他们不仅培养了大量推崇理学的士人，故而全祖望有所谓“四家之徒遍天下”之说，特别是将这一能够表达士大夫价值理想、人格理想的学说，发展成为民间士人普遍认同的思想学说。这一个以民间书院为依托的新儒学思潮的兴起，不局限于谈论性理的少数道学家，而是体现出宋代士大夫群体崛起。而庆元党禁事件的发生，可以理解为君主、权臣的政统力量与士人、理学的道统力量的一场政治较量和文化博弈。这也能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地方书院在宋代士人思想整合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庆元党禁事件中，以朱熹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化集团，不幸卷入韩侂胄、赵汝愚的朝廷党争之中。但是，从庆元党禁的演化过程和历史结局来看，均可以看出南宋新儒家文化集团已经成为君主、权臣的政统力量所警惕、防范与打击的政治力量。庆元党禁事件爆发后，首先受到打击的是所谓“道学之人”，他们统统均看作是“逆党”“伪学”，理学家著作书籍被禁毁，科举考试中凡涉理学之义理者，一律不予录取，同时还包括理学家注释的六经和《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也难逃厄运。特别是赵扩还下诏订立《伪学逆党籍》，入籍者除了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等人外，特别是包括了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简、袁燮、杨宏中、蔡元定、吕祖泰等学术活跃的儒家士大夫。从《伪学逆党籍》的名单，可以发现庆元党禁打击的“伪学逆党”，将乾道、淳熙以来体现学术大盛、学派林立的不同学派，即在朱熹闽学学派之(朱熹、蔡元定等)外，还包括张栻湖湘学派(彭龟年)、吕祖谦婺

学学派(吕祖俭、吕祖泰等)、陆九渊象山学派(杨简、袁燮等)，特别是还有被看作是事功之学的浙东学派(陈傅良、叶适、徐谊等)著名学者。他们中有的罢官，有的被捕，有的充军，甚至还有被迫害致死。也就是说，南宋朝廷的权力集团其实是将活跃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不同学派均看作是自己的敌人。可见，庆元党禁实际上是南宋帝王、权臣构成的统治集团对宋代自由学术、民间书院的一次政治打击，使得乾道、淳熙年间的那种书院繁荣、学派林立的局面不再存在。

虽然在君主及权臣组合的政统力量与士人及书院组合的道统力量之间的政治较量中，政统力量取得了短暂的胜利，而士人学术、民间书院的道统力量受到严重打击，但是由儒家士大夫群体共识形成的道统力量却赢得长久的人心。庆元党禁事件只维持几年，统治集团意识到士大夫反抗力量的强大，在所谓“真伪已别，人心归正”的大趋势下，伪学、逆党之禁全面废解。理学家纷纷平反，理学和书院均走向发达。此后，由理学家推动的书院教育得到更大的发展，理学及其《四书》学更成为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

考察庆元党禁解除之后的书院，不仅仅是数量大增，而且是理学化程度更高。朱熹理学及其《四书》学已经完全成为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如南宋学者徐元杰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就规定，书院生徒“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24]。这一规定，不仅强调了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主要学习内容，而且还体现了朱熹所主张的研习次第。宋末建康明道书院则不仅规定“礼仪皆仿白鹿书院”^{[25](312)}，而且从该书院的系列讲义可以看到，当时明道书院的讲学中，《四书》是最主要的内容。其中，程必贵于景定三年(1262年)、胡崇于淳祐十一年(1251年)、赵汝训于宝祐三年(1255年)、胡立本于景定元年(1260年)开堂讲《大学》，程必贵于景定三年(1262年)、张显于开庆元年(1259年)开堂讲《中庸》，吴坚、周应合于开庆元年(1259年)开堂讲《论语》^{[25](318-331)}。他们有关《四书》的阐释、发挥，均为继承程朱之说而来。甚至偏处四川郪县(今三台县)一隅，由该县士人杨子谟私人创建、存续于孝宗淳熙年间至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的云山书院^[26]，其生徒也以《四书》为主要学习内容：“吉月、月半诵《论》、《孟》、《中庸》、《大学》语。”^[27]南宋后期学者熊禾也谈到当时以《四书》学

为核心的理学受到广大士人尊崇的情形说：“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四书》衍洙泗之传，《纲目》接《春秋》之笔。当今寰海数州之内，何人不读其书。”^[28]南宋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中特设《论语》《孟子》类，认为“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合为一类”。^[29]目录学中的这一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学《四书》学著作在当时学界广泛流传的历史状况。

理学及其《四书》即成为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理学派通过书院而推动的《四书》学教育，更是使理学的《四书》学教育成为南宋士林文化共识。应该说，作为士大夫之学的《四书》学教育，对宋代士人、士大夫群体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南宋时期，从与金兵的对立，到反抗强悍的蒙古人，南宋士大夫群体表现出难得的道德意志，“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乃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30]如南宋末年，岳麓书院师生与潭州将士共同参加守城战斗，浴血奋战，全部战死在战场，鲜明反映出理学及《四书》教育产生的社会效果。

到了南宋后期，特别是到了元明清时代，理学及其《四书》学的地位一步步提升，上升到官方的国家学说与意识形态，成为每一个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理学及其《四书》学之所以能够上升为国家学说与意识形态，应该是源于理学及《四书》学的学术声望、文化影响，而帝王及朝廷不过是顺应士人社会的主流思潮，以获得士大夫群体的广泛支持，进而提升自己权力的声誉和影响。特别是提升理学地位最用力的是元朝、清朝，他们原本属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而更加需要借用理学及其《四书》学的声誉和地位以提升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他们对于理学思想与帝国政治存在的矛盾，又是通过对理学及其《四书》学的不断修正、篡改，如《四书》学的士大夫道统论就与帝国皇权的政统就存在鲜明矛盾，而明清帝王很轻易就将自己说成的道统的代表。

参考文献：

- [1] 李存山. 宋代“新儒学”与“理学”[J]. 中原文化研究, 2019(2): 5-10.

- LI Cunshan. The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Li learning in song dynasty[J].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2019, 7(2): 5-10.
- [2] 范能潜. 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年谱·天圣五年[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720.
- FAN Neng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Fan Zhongyan//Fan Wenzheng's Chronicle: The Fifth Year of Tiansheng[M]. Nan 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04: 720.
- [3] 石介. 徂徕石先生文集: 卷 5·怪说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63.
- SHI Jie. Tall Tales II,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ter Culaishi, Vol. 5[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63.
- [4] 全祖望.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中册[M]// 鮑琦亭集外编: 卷 45·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 朱铸禹汇校集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QUAN Zuwang. Variorum of Quan Zuwang's Collected Works, Mid. Volume[M]// A Reply to Zhang Shichi's Inquiry about the Four Academies, in The Collection of Jieqiting, Vol. 45.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Zhu Zhouyu.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5] 周敦颐. 周敦颐集: 附录 1·周敦颐墓志铭[M]. 陈克明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85.
- ZHOU Dunyi. Zhou Dunyi's Collection: Appendix 1·and Zhou Dunyi's Epitaph[M]. Ed. Chen Kem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85.
- [6] 周敦颐. 周敦颐集: 附录 1·周敦颐年谱[M]. 陈克明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00.
- ZHOU Dunyi. Zhou Dunyi's Collection: Appendix 1·and Zhou Dunyi's Chronology[M]. Ed. Chen Kem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100.
- [7] 胡宏. 胡宏集//碧泉书院上梁文[M]. 吴仁华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02.
- HU Hong. Hu Hong's Collected Works //Shangliang Prose for Biquan Academy[M]. Ed. Wu Renhu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202.
- [8] 张栻. 张栻集, 南轩先生文集: 卷 14·论语说序[M]. 杨世文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969.
- ZHANG Shi. Preface to Annotation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Zhang Shi's Collected Works fro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ter Nan Xuan, Vol. 14[M]. Ed. Yang Shiw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5: 969.
- [9]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34·答吕伯恭[M]// 朱杰人, 严佐之, 等. 朱子全书: 第 21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1502.
- ZHU Xi. A Reply to Lvogong,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ter Hui An, Zhuwengong, Vol. 34[M]// Zhuzi's Complete Works, Vol. 21. Ed. Zhu Jieren, Yan Zuozhi,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Hefei: Anhu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2: 1502.
- [10]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74·沧州精舍示学者[M]// 朱

- 杰人, 严佐之等. 朱子全书: 第24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3593-3594.
- ZHU Xi. Encouragement to the Scholars in Cangzhou Jingshe,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ter Hui An, Zhuwengong, Vol. 74[M]// Zhuzi's Complete Works, Vol. 24. Ed. Zhu Jieren, Yan Zuozhi,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Hefei: Anhu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2: 3593-3594.
- [11] 陆九渊. 陆九渊集卷 5·与戴少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63.
- LU Jiuyuan. A Letter to Dai Shaowang,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ujiu Yuan, Vol. 5[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63.
- [12] 黄宗羲. 宋元学案: 卷 5·象山学案[M]. 全祖望补修.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75.
- HUANG Zongxi. Study Cases of Xiangshan, in Study Cases of Song & Yuan. Vol. 5[M]. Supplemented by Quan Zuw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275.
- [13] 陆九渊. 陆九渊集: 卷 36·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LU Jiuyuan. Chronicle,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u Jiuyuan, Vol. 36[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14] 黄宗羲. 宋元学案: 卷 51·东莱学案[M]. 全祖望补修.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653.
- HUANG Zongxi. Study Cases of Donglai, in Study Cases of Song & Yuan. Vol. 51[M]. Supplemented by Quan Zuw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1653.
- [15] 顾允成. 小辨斋偶存: 卷 7[M]// 文津阁四库全书, 第 1296 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688.
- GU Yuncheng. Preservatives in Xiaobianzhai, Vol. 7[M]//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Preserved in Wenjin Pavilion, Vol. 1296[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688.
- [16]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75·中庸集解序[M]// 朱杰人, 严佐之等. 朱子全书: 第 24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3640.
- ZHU Xi. Preface to The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ter Hui An, Zhuwengong, Vol. 75[M]. Zhuzi's Complete Works, Vol. 24. Ed. Zhu Jieren, Yan Zuozhi,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Hefei: Anhu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2: 3640.
- [17] 王应麟. 困学纪闻: 卷 8·经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094.
- WANG Yinglin. On Classics, in Learnings and Comments on Classics, Vol. 8[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8: 1094.
- [18] 皮锡瑞. 经学历史: 卷 8·经学变古时代[M]. 周予同注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20.
- PI Xirui. The Age of Classics Renaissance,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s Study, Vol. 8[M]. Annotated by Zhou Yut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 220.
- [19]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69·学校贡举私议[M]// 朱杰人, 严佐之等. 朱子全书: 第 23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3363.
- ZHU Xi. Private Comments on the School's Imperial Exam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ter Hui An, Zhuwengong, Vol. 69[M]// Zhuzi's Complete Works, Vol. 23. Ed. Zhu Jieren, Yan Zuozhi,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Hefei: Anhu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2: 3363.
- [20]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王孝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CHENG Hao, Cheng Y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enghao and Chengyi[M]. Ed. Wang Xiaoy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 [21] 张载. 张载集[M]. 章锡琛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272.
- ZHANG Za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zai[M]. Ed. Zhang Xich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8: 272.
- [22] 周应合. 景定建康志: 卷 29·建明道书院[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67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72.
- ZHOU Yinghe. The Building of Mingdao Academy, in Chronicles of Various Buildings in Jingding, Vol. 29[M]//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Preserved in Jingyinwenyuan Pavilion, Vol. 674.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of Taiwan, 1986: 572.
- [23]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76·中庸章句序[M]// 朱杰人, 严佐之等. 朱子全书: 第 24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3674.
- ZHU Xi. Preface to The Chapters and Sentences from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ter Hui An, Zhuwengong, Vol. 76[M]// Zhuzi's Complete Works, Vol. 24. Ed. Zhu Jieren, Yan Zuozhi,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Hefei: Anhu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2: 3674.
- [24] 徐元杰. 梅野集: 卷 12·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81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775-776.
- XU Yuanjie. Catalogue of Schools and Academies in Yanping,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eiye, Vol. 12[M]//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Preserved in Jingyinwenyuan Pavilion, Vol. 1181.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of Taiwan, 1986: 775-776.
- [25] 周应合. 景定建康志: 卷 29·建明道书院[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489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318-331.
- ZHOU Yinghe. The Building of Mingdao Academy, in Chronicles of Various Buildings in Jingding, Vol. 29[M]//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Preserved in Jingyinwenyuan Pavilion, Vol. 489.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of Taiwan, 1986: 318-331.
- [26] 胡昭曦. 四川书院史[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11.
- HU Zhaoxi. The History of Academies in Sichuan[M]. Chengdu: Bashu Books House, 2000: 11.

- [27] 魏了翁. 鹤山集: 卷 74·杨公墓志铭[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73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64.
WEI Liaoweng. ·Epitaph of Yang Taizhi,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eshan, Vol. 74[M].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Preserved in Jingyinwenyuan Pavilion, Vol.1173.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of Taiwan, 1986: 164
- [28] 熊禾. 勿轩集: 卷 4·重修武夷书院疏[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88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800.
XIONG He. ·On Renovation of Wuyi Academy,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uxuan, Vol. 4[M]//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Preserved in Jingyinwenyuan Pavilion, Vol. 1188.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of Taiwan, 1986: 800.
- [29]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卷 3·语孟类[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67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72.
CHEN Zhensun.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in Solutions to Problems in Zhizhai Records, Vol. 3[M]//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Preserved in Jingyinwenyuan Pavilion, Vol. 674.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of Taiwan, 1986: 572.
- [30] 脱脱, 等. 宋史: 卷 446·忠义传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3149.
TUO Tuo, et al. Preface to Biography of the Faithful and the Righteou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Vol. 446[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7: 13149.

The *Four Books* tradition and education in academies of the Song Dynasty

ZHU Hanmin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 arose a particular episode of the simultaneous advent of academie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flourishing of Neo-Ruist thought. The Neo-Ruists, taking the *Four Books* as the canonical works upon which education in the academies was to be based, widely disseminated a Neo-Ruist version of the *Four Books* tradition in the folk society at large, which in turn exerte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scholar-official clas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mperial court. The *Four Books* tradition of the Song Ruists established “studying to achieve sagehood” as the goal of education, and encouraged the scholar-officials to attain noble and moral personality, which meant to enable them to take upon themselves the great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co-governing the whole and wide world. The Song Ruists, by exploiting education in academies based on the *Four Books*, enhanced the pursuit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as both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ubjects, provided impetu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Neo-Ruist teachings in folk society, 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thought collective” among the scholar-officials.

Key words: *Four Books* tradition; academies; Neo-Ruism; education; thought collective

[编辑: 谭晓萍]